

[在文明的十字路口]

# 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群体文化心理蠡测(下)

马丽蓉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东研究所, 上海 200083)

中图分类号: G1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0586(2007)03-0021-07

## (三)

“9·11”事件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就面临着两难的抉择:要么站在美国一边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要么庇护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若选择前者,伊斯兰国家政府公开支持西方基督教反穆斯林的联盟就是一个风险巨大的行动;若选择后者,阿拉伯国家将因与恐怖组织有关联被列入“邪恶轴心国”而遭受美国的经济制裁或军事打击。基于一种素朴的泛阿拉伯信仰共同体的认同本能,本·拉登反抗美国霸权主义的斗争在每一个伊斯兰国家都能找到同情者甚至追随者,美国反恐5年来仍未抓获本·拉登、塔利班势力又卷土重来就是明证。同时,“9·11”事件不仅给美国、也给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带来了负面影响,尤其使这些国家的政府备受内外挤压,社会矛盾激增,生存环境恶化,百姓怨声载道。大体表现为:

- 一、外受战争、制裁之苦,内遭人口、失业重压,阿拉伯国家饱受内忧外患

四次中东战争,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不仅都以失地辱国而惨败,还留下了一个跨世纪的“和平死结”——巴以冲突。

在美国“袒以压巴”政策的庇护下,以色列不仅无视联合国决议与国际社会的抗议而迟迟不撤出“被占领土”,还公然“单边主义”地扩建定居点、构筑隔离墙甚至自定国界,沙龙的“加沙撤离秀”与奥尔默特的“指点江山”即为明证。同时,当选后的哈马斯又陷入“内忧外患”的重重包围当中,巴以和谈前途更加渺茫,伊斯兰第三大圣地的回归遥遥无期;两伊战争和海湾战争,既使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饱受战争之苦,还使伊拉克人民深陷国际制裁的重压而苟存数年。作为美国“大中东改造”的“民主样板”,伊拉克的安全局势日趋危急,教派纷争严重,恐怖袭击事件频发,甚至成为滋生反美武装力量的重要策源地,伊拉克各界人士纷纷表示,伊拉克战争爆发3年多来,伊拉克人民的处境正在恶化,甚至不如萨达姆统治时期。因为连最起码的生存安全都无法保障,其他也就无从谈起了。更为可怕的是,随着伊朗政府与伊拉克什叶派不断加强联系,也随着美国和伊朗就伊拉克问题的外交周旋,未来的伊拉克政府有可能会沦为美国或伊朗的傀儡政府,使伊拉克或成为亲美的世俗制国家或成为波斯属性的神权制国家,因而使伊拉克的阿拉伯属性遭到削弱。这不仅使伊拉克的不幸,更是阿拉伯民族的不幸。伊拉克重建的结果,要么成为美伊的傀儡政权,要么深陷内战苦海而难以自

收稿日期: 2007-03-2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6JJDGJW007)

作者简介: 马丽蓉(1966—),女(回族),新疆乌鲁木齐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阿拉伯世界研究》副主编,博士。

拔; 伊朗核危机更将阿拉伯—伊斯兰地区拖入战争或制裁的泥潭, 而深受西方长期经济制裁之苦的当属伊拉克和伊朗, 可能还会殃及叙利亚等“邪恶轴心国”。

据调查, 截至 2000 年穆斯林人数首次超过基督教徒, 美国保守派代表布坎南就疾呼: “伊斯兰世界保留了西方已经失去的东西: 生育孩子的愿望和传承他们文明、文化、家族和信仰的意志。如今, 人们很难发现一个常住人口没有在下降的西方国度, 同样也难以找到一个常住人口尚未发生爆炸的伊斯兰国家。西方也许已经学会了伊斯兰不知道的东西, 但穆斯林却记住了西方所遗忘的东西: ‘有信仰就有希望’ (There is no vision but by faith)。”<sup>[1]</sup>事实上, 伊斯兰国家的高生育率和高失业率是成正比的: “利比亚有 60 以上的人口年龄在 15 岁以下, 失业率接近 30 。沙特有 38 的人口年龄在 15 岁以下, 失业率为 25 。国际劳工组织负责人说, 该地区普遍是这种情况, 这里的人口增长率为世界最高, 15—24 岁未就业的年轻人占全世界的 1/4 以上。”<sup>[2]</sup>据美国人口调查局 (US Census Bureau) 估计, 沙特的人口已从 1970 年的 600 万增长到 2004 年的 2 200 万; 在未来几年, 即使出生率明显下降, 人口总数也可望在 2010 年达到 3 100 万, 2020 年达到 4 200 万, 2030 年达到 5 500 万; 15—24 岁的年轻人将从 2000 年的 360 万增加到 2025 年的 630 万。沙特政府估计本国男性的失业率已达到 12 , 而许多专家私下估计真正的失业率超过 20 。”<sup>[3]</sup>

在人口和失业的双重压力下, 阿拉伯国家政府的社会经济压力与日俱增, 阿拉伯产油国除受到世界能源市场的各种冲击外, 还受到美国能源战略的影响乃至美沙关系的左右: 冷战时期, “美国的重点是, 保护沙特这个保守的宗教国家抵御信奉无神论的超级大国苏联。苏联共产主义既威胁美国的自由民主, 也威胁沙特阿拉伯的神权君主制。作为交换, 沙特保证美国获得价格不昂贵并且稳定的石油来源。当苏联瓦解时, 美国在 1990 年对萨达姆·侯赛因侵占科威特所作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成功反应似乎证明, 在共产主义崩溃后出现的混乱和不可预测的新的世界上, 沙特人仍像在冷战时期一样需要美国的保护伞。作为交换, 沙特人也乐于发挥他们作为全球石油市场关键的、低成本的、高质量的‘摇摆不定’的生产者的作用, 以降低能源价格。”<sup>[4]</sup>(P93-94) 但小布什上台后, 提出了增加能源战略储备、减少对进口石油依赖的能源新战略, 又采取与急于挑战沙特能源大国地位的俄罗斯加强能源合作的战略举措, 并将更多注意力转向资源丰富、开采潜力巨大的加拿大、里海和非洲等地的新石油<sup>[5]</sup>(P35)。美国也逐步减少了对沙特石油的依赖。“9·11”事件, 又恶化了美沙关系, 尤其因本·拉登和其他 15 名嫌疑犯均为沙特国教伊斯兰教瓦哈比派的教徒, 美国民众和传媒便将罪责归咎于宗教的狂热与唆使, 认为伊斯兰教瓦哈比派是培育过激行为、不宽容并产生暴力的“温床”<sup>[5]</sup>(P323)。美国政府开始重申美沙关系, 并在其主流传媒上讨论此问题, 尤其当传媒“首次把注意力集中到沙特的种种做法上时, 那些以前从未被隐瞒、而是被忽略或得到辩解的、起扰乱作用的两国关系

的特点, 马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从‘马德拉萨’(Madrasa) 制度到阿富汗再到奥萨玛·本·拉登的‘产生’, 事后的认识似乎勾画了一幅沙特在过去 10 多年里所有胡作非为的清晰图画。随着这些冷酷无情的情景在‘9·11’事件的震惊中变得清晰起来, 美国的决策者和左右舆论的人作出了强烈的反应……如果沙特拒绝顺从美国的压力, 美国应该采取一些没有特别提到的方式‘攻击’沙特的油田”<sup>[4]</sup>(P96-97)。可以说, 埃及、沙特、约旦等国亲美政府陷入左右为难、两边都不讨好的窘境: 因亲美而遭本国民众反对、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敌视, 又因“反恐”和民主改革不得力而招致美国冷遇; 伊朗、叙利亚等国政府与美国对抗的结果是, 或深陷战火, 或战争逼近, 在内战与外压夹击下造成经济停滞、生活动荡、民不聊生; 巴勒斯坦民众建国的热望又相继被美欧的变相性经济制裁和黎以战争所浇灭, 人道主义灾难震惊世界。

因此, 整个中东地区, 尤其是阿拉伯国家均承受着程度不同的内忧外患的压力, 国家前途令人堪忧。

## 二、在战乱中裂变为不同的利益阵营, 伊斯兰精神与物质版图四分五裂

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不是铁板一块, 国土、石油及水资源等划分所产生的客观矛盾使各国之间心存芥蒂, 尤其是两伊战争、海湾战争及“9·11”事件的爆发更加剧了彼此的矛盾与冲突。

两伊之间长期存在着民族矛盾、教派纷争和边界争端, 萨达姆称霸海湾的雄心与霍梅尼输出“伊斯兰革命”致使两伊关系急剧恶化, 双方关系最终滑向公开的对抗。历时 8 年之久的两伊战争导致了自埃及媾和以来阿拉伯世界政治力量的又一次分化重组: 约旦、摩洛哥、北也门和海湾六国等或明或暗地支持伊拉克; 叙利亚、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南也门等公开支持伊朗; 埃及、突尼斯、苏丹、黎巴嫩和巴解组织则保持中立。在历次的中东战争中, 苏美两国一般都态度鲜明, 各支持一方, 但在两伊战争中却都公开声明保持中立。不过, 美国在保持“中立”的同时, 竭力维持两伊的均势以谋求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来抵制苏联在该地区的影响。战争爆发后, 美国以保护海湾石油航道之名在海湾及其附近海域集结了大批军舰准备提供军援。1980 年 9 月底, 应沙特的请求, 美国决定加速向其运送武器装备, 并派出 4 架空中预警飞机部署在沙特以负责整个海湾六国的空防。里根上台后更加重视沙特作为美国在海湾地区“战略支柱”的作用, 与沙特开展了广泛的军事合作, 美国也乘机加强了在海湾的军事存在并扩大了与海湾其他国家的军事合作, 而美国支持伊拉克成为海湾军事强国后又助长了萨达姆发动新战争的野心, 海湾危机又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再次拖入战争泥潭。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是近代以来第一个由阿拉伯国家对另一个阿拉伯国家发动的侵略。阿拉伯世界一直竭力维护的阿拉伯团结的神话这一次被彻底击碎, 阿拉伯各国处于尴尬、沮丧、失望的境地<sup>[6]</sup>。而海湾战争的起因主要是萨达姆

既有吞并科威特财富的野心,也有觊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霸主的企图。一向“团结”的阿拉伯各国开始了紧张的外交斡旋,力求“把问题局限在阿拉伯范围,不使其任何形式的国际化”。但科伊谈判最终破裂,萨达姆于1990年8月2日悍然发动了海湾战争,阿拉伯世界再次四分五裂,各国的民族主义迅即取代了曾令人热血沸腾的泛阿拉伯主义。8月7日,军力虚弱而经济富裕的沙特深恐科威特危机在沙特重现而被迫同意美军进驻,8月10日召开的阿拉伯首脑会议使阿拉伯世界分歧公开化,与会的20个国家中只有12国赞成“伊拉克立即从科威特撤军”、“呼吁美国派兵保卫沙特”、“阿拉伯国家派军队去沙特”<sup>[6](P297)</sup>。阿拉伯世界分裂为三大阵营:埃及、沙特、叙利亚、巴林、卡塔尔、阿曼、阿联酋、黎巴嫩、索马里、吉布提、摩洛哥及科威特等反对伊拉克;巴勒斯坦、也门、约旦、利比亚、苏丹等支持伊拉克;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毛里塔尼亚等属中立国,阿拉伯合作委员会、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等区域合作组织也因此名存实亡。海湾战争使阿拉伯国家再次分裂,由过去阿以冲突为矛盾的分界转为以对待伊拉克入侵的态度为界,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原有凝聚力有所削弱,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如穆巴拉克致力于推动开罗一大马士革—利雅得的新轴心体系,海湾战争的最大赢家伊朗同欧盟的关系趋缓,伊拉克的失败既削弱了阿拉伯世界抗击以色列的力量,又使以色列乘机加强了自身的军事优势。海湾战争终结了美苏争夺中东的历史,世界开始进入“一超多强”的失衡期,而美阿、以阿力量的失衡更成为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内忧外患的外因。

“9·11”事件的爆发对世界政治格局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布什“要么与美国站在一起,要么与恐怖分子站在一起”的反恐战略影响下,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分裂成四大阵营:埃及、沙特、约旦等属于配合美国反恐的亲美国家,伊朗、叙利亚等成为与美国作对的“邪恶轴心国”,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黎巴嫩的真主党及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等激进的伊斯兰武装组织由“民选”走向执政前台,由来自各国的圣战者所组成的基地组织。但哈马斯当选、伊朗核危机又使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共同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阿拉伯—伊斯兰各国历来团结一致,但在美欧联合封杀哈马斯、巴勒斯坦组建联合新政府、阿以领土纠纷等问题上,各国的态度和立场均不如先前般旗帜鲜明地达成共识了。甚至个别国家将巴勒斯坦问题作为与西方国家政治交易、经济合作的砝码,也有个别国家以巴勒斯坦问题作为延缓国内改革的挡箭牌。可以说,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缺乏与其他国家一起干的领导力量:阿联酋自行其是,抬头关注其他国家的时候越来越少;埃及从长期的停滞中苏醒;沙特忙于自身问题而难顾其他;伊拉克重建之途坎坷崎岖;伊朗核问题危在旦夕……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很久没有如此分裂、如此不像一个整体了,且其四分五裂不仅表现在有形的物质上,更反映在无形的精神上。除关于油气分布、海域、地域、边界纠纷等历史遗留的问题外,沙特、埃及分别因美国的驻军和巨额经援等缘故大大降低了自身的原有声望,失去“核心国家”的阿

拉伯—伊斯兰世界群龙无首、一盘散沙。不可回避的是,阿拉伯联盟、伊斯兰会议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等的作用正在被弱化,在巴勒斯坦建国、伊拉克重建、伊朗核危机以及黎以战争等中东重大问题上已经或正在失去应有的话语权。

有学者认为,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四分五裂的原因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由苏联解体导致了国际平衡的崩溃所致。因为苏联的崩溃导致美国唯一一个超级大国的出现,同时也促成100多万俄罗斯犹太人移居以色列,其中有30是大学毕业生,这些移民加强了以色列的科技、工业和军事力量,促使以色列无视周边国家的感情和利益。二是美国外交政策掌握在亲以色列的所谓新保守派手里,这些人为了发动战争向伊拉克施加压力、鼓励以色列没收巴勒斯坦土地并在没收的土地上建定居点。三是目前一些中东国家的无政府现状也造就了美国、以色列及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各种各样的原教旨主义组织发展并壮大<sup>[7]</sup>。可见,造成大分裂的原因非常复杂,但在强调美国中东政策制衡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这一外因时,更不能忽视阿拉伯—伊斯兰各国经济滞后于全球化、身份认同陷入误区等重要的内因,而这些内外成因也是身处十字路口的阿拉伯国家首先需要思考和解决的现实问题。近年来沙特开始努力恢复昔日伊斯兰盟主的地位,并积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如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亲王2005年2月5日在巴林首都麦纳麦发表了重要讲话,对一些西方国家与该地区国家签订双边安全协议的诚意提出了质疑,建议联合伊拉克、伊朗和也门同海湾合作委员会六国共同建设该地区安全体系;美国学者也认为,在穆巴拉克的统治下,埃及已变成了人们在思想上类似于阿富汗的地方,成为反美和反犹太主义仇恨在整个阿拉伯世界蔓延的知识界和传媒界的麦加<sup>[8]</sup>。西方学者都承认“阿拉伯世界需要埃及外交”,在处理阿拉伯内部事务上,埃及一直享有极高的声望。虽然穆巴拉克总统由于在内政问题上迟钝冷淡而遭受指责,但他仍然是为其他阿拉伯国家所接受的唯一的阿拉伯领导人,且华盛顿也寄希望于开罗来担当巴勒斯坦冲突的调停人和逐渐壮大的伊朗的平衡力量。埃及红海旅游胜地沙姆沙伊赫已成为阿拉伯世界内的外交中心<sup>[9]</sup>;东盟等区域性组织也需要进行自我调整,尽快扭转被动局面,发挥重振士气、聚合民心的特殊作用。可以肯定的是,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精神与物质版图的四分五裂只是暂时的,美国等西方霸权主义者能够仗仗强大的国力在军事侵略、能源攫取上获胜,但终难彻底战胜中东穆斯林的伊斯兰信仰,更难如愿收获美式民主的胜利果实,美英联军深陷伊拉克恐怖泥潭而难以抽身即为明证。

### 三、西方传媒散布的“恐伊症”肆虐全球,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声名狼藉”

在西方政治家、学者和传媒的精心鼓噪下,“好战而恐怖的伊斯兰”如瘟疫般肆虐全球,一时间“恐伊症”蔓延全世界各大传媒。对此,美籍约旦女教授娜蔓·艾尔阿里深有感

触, 她认为, 伊斯兰对美国人和美国社会不存在任何威胁, 普通美国人对穆斯林的恐惧感来自他们对伊斯兰的无知和误解: 人们对伊斯兰的错误认识可以归纳为四大误区: 第一, 世界上的穆斯林不是一种刻板的模式, 并非所有的穆斯林都是阿拉伯人; 第二, 伊斯兰不鼓动穆斯林对非穆斯林采取暴力, 而且不许强行逼迫别人信仰伊斯兰; 第三, 恐怖主义绝不是伊斯兰的教义或穆斯林的行为准则, 这是极大的误解; 第四, 西方社会认为穆斯林的女子受压迫, 不自由, 这是道听途说的长期歪曲, 没有根据。具体而言, “伊斯兰是和平的宗教, 伊斯兰的信徒必须以和平的方式与任何人相处。穆斯林的行为标准是敬畏真主, 对所有的人表示仁爱, 因为全人类都是真主造化的平等生灵, 都是来自一个祖先的后代, 都是兄弟姐妹, 这是伊斯兰的人类学原理”。而“9·11”袭击事出有因, 应当进行调查, 找到人类社会有压迫就有反抗的因果关系, 发现暴力和仇恨的根源, 而不能说那些人是信仰什么宗教。如果简单地把一种罪恶归于某种信仰或者教条, 那是躲避事实, 害怕事实揭露自己伤害过别人的行为, 至少, 这样的思维方式是不科学的、不客观的、缺乏实事求是精神的。如果说“9·11”事件仅是施暴者的信仰所致, 就是不许人们思考, 是一种强制的政治势力在灌输一种特定的思想。因为, 穆斯林进行圣战是有条件的, 比如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保护自己的妻子儿女以及维护和平的社会和自己的祖国等进行自卫, 均属圣战的具体内容。这就是为了真主和正义而战, 为了信仰的真理, 任何人类正常的文明都应当对这样的崇高的奋斗给予认可, 它绝不同于野蛮的屠杀和种族清洗。伊斯兰教所倡导的“吉哈德”可以翻译为“圣战”, 但也可译为“奋斗”和“努力”。人如果不知努力, 不进行奋斗, 这样的社会是无望的, 没有了进取精神。战争只不过是一组人群进行奋斗和努力的最激烈的形式而已。“吉哈德”是每个穆斯林的责任, 因此, 穆斯林是充满活力和奋进精神的人群, 必要时, 他们才进行战斗。穆圣曾强调, 战争只是次要的“吉哈德”, 穆斯林重大的“吉哈德”则是日常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与个人的私欲作不懈的斗争。同时, 《古兰经》早在 1400 多年前就对女子的人权作了具体的规定, 她们有财产权、继承权、社会发言权、婚姻自由权、教育子女权、在家庭中当家作主的权利……穆斯林的女子在装束上要遵守伊斯兰文明, 这是服从真主的敬畏表现, 保护女子社会地位和尊严的需要。女子对社会的功能和作用不在于外形和容貌, 而是内心的信仰和娴熟的品质。伊斯兰反对男女之间没有区分的混杂和随心所欲的交往, 男人和女人应当属于两种文化氛围, 因为他们有不同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真主把男女造成不同的类型, 所以对男女的生活方式有不同的指导, 这是伊斯兰合理的教义, 有利于家庭温暖和社会安宁。有少数穆斯林国家和民族愿意保持自己传统的习惯, 对女子有过分的限制, 伊斯兰从原则上给予各民族文化以宽容和许可, 而绝不是伊斯兰本身压迫妇女, 这是两回事。许多遵守伊斯兰法制的社会, 女子被允许参加社会活动, 担任政府重要职务, 如政府总统、总理、部长、议员、校长或工商业经理, 这方面有数不清的例

子<sup>[10]</sup>。但实际上, 因“恐伊症”已渗透到全球的各个角落, 甚至在年轻一代心中都扎下的误解与歧视的根, 并引发以暴易暴的流血冲突: 继巴黎骚乱不久, 澳大利亚悉尼郊区的克罗纳拉海滩于 2005 年 12 月 11 日发生了种族冲突事件, 闹事者高呼种族主义口号, 追击殴打具有中东相貌特征的人们。起因是两名海上救生员在此海滩附近遭人殴打, 此地正是黎巴嫩裔居民聚居处, 引发“声讨阿拉伯人”的怒潮, 甚至攻击中东裔居民, 破坏其房舍与汽车。11 日, 数千名澳人在克罗纳拉海滩举行集会, 抗议两名义务救生员遭黎巴嫩裔歹徒的殴打, 集会升为骚乱, 一些白人袭击了中东裔人。12 日晚集会后, 中东裔人开始围攻白人并高喊: “打倒澳洲白人”、“反对歧视阿拉伯移民”等口号。“报复”成为手机短信中频繁出现的词语, 一条短信在阿裔年轻人中速传: “兄弟们, 我们应该携起手来, 让那些该死的澳仔充分认识到阿拉伯人的力量。”12 日晚, 数百名中东裔民众聚集在悉尼西郊的一座清真寺, 和警方紧张对峙, 要求为前一天发生的骚乱讨回公道。据澳大利亚《悉尼晨报》称, 近年来, 澳大利亚新纳粹的种族主义势力渐渐抬头, 开始进行一些有预谋的活动, 他们曾在珀斯等城市焚烧犹太人、阿拉伯人开的餐馆和商店。在 2002 年的巴厘岛爆炸案中, 88 名澳大利亚人不幸遇难, 此后澳大利亚白人对阿拉伯裔族群的仇视心理日益增加。最近几年来, 澳大利亚人多次成为恐怖袭击的受害者, 使得这种敌视心理有增无减。澳大利亚社会学家戴维·弗林特认为, “最近几年来, 澳大利亚各族群之间的差距正在不断拉大, 一些弱势群体处于被边缘化的危机, 使他们对社会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参见《新闻晨报》2005 年 12 月 14 日的相关报道)。其实, 悉尼海滩群殴事件也和巴黎骚乱一样折射出客居欧美的阿拉伯裔穆斯林难以融入当地社会、收入不高、生活在破败社区且备受到歧视这一严酷现实。身处基督教文化汪洋中的穆斯林个体, 尤其在“9·11”后的境遇急剧恶化, 在受所在国主流社会物质与文化挤压的同时, 只能借助阿拉伯语传媒来了解母国文化, 聊寄思乡漂泊之情。因此, 成长于欧美的阿拉伯裔穆斯林青年易参与或制造伦敦连环大爆炸等恐怖事端来宣泄身处“恐伊症”重围中个体的极度愤怒。相比较而言, 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的民众在与入侵者以色列、美国、英国等的非对称战争中, 被西方传媒描绘成以色列是为了维护自身安全而与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进行斗争的、美英联军是为了解放伊拉克民众而与伊境内的恐怖分子发生冲突的, 原本正义的、反侵略的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穆斯林均成为制造人体炸弹与汽车炸弹的恐怖分子, 再加上美国和以色列以及紧跟其后的欧洲一些国家传媒的大肆渲染, 使得“恐伊症”在西方肆意弥漫。借伊朗核问题与“9·11”5 周年纪念活动之机, 布什政府又大肆诋毁阿拉伯—伊斯兰形象, 先有布什公开宣称“伊斯兰法西斯主义”和“为文明而战”, 后有梵蒂冈教宗恶意指读伊斯兰教与穆圣, 激怒全球穆斯林的强烈抗议。因此, 要想逼近阿拉伯—伊斯兰问题的真相, 就得超越西方传媒的报道框架, 超越西方对伊斯兰文明的臆断, 尤其要认清“恐伊症”蔓延全球的西方霸权主义本质。因为, 西方传媒在阿拉

伯一伊斯兰世界身陷“声名狼藉”的过程中所起的不良作用以及对世界穆斯林所造成的伤害是极为严重的。

#### 四、结 语

格雷厄姆·福勒在他的著作《政治伊斯兰》中曾分析道：

“穆斯林社会反西方的大部分历史情绪，都是在几个世纪的冲突和争斗，以及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西方权力和霸权、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等一系列问题的基础之上产生的。这些问题与宗教或哲学问题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联系。在此，伊斯兰主义只是充当了一个载体，作为不与建立伊斯兰国家本身这个目标，甚或宣传伊斯兰直接相关的许多问题的一个支撑。也就是说……如果整个中东属于基督教而不是穆斯林的世界，那么地区紧张局势虽然可能不会完全一致，但也可能由于历史、石油、权力、侵略和地缘政治引发的紧张关系而非常相似。”<sup>[11]</sup>

可以说，诸种历史情绪的心理积淀，是中东穆斯林饱受外来殖民侵略与压迫历史的某种折射，他们最希望尽快妥善解决历史隐患带给现实的灾难。“如果让黎巴嫩人开口发言，他们想谈的是叙利亚对黎巴嫩的占领。当伊拉克人有机会聚在一起时，他们投票支持成立政府，而不是发动叛乱。当你倾听大多数巴勒斯坦人的心声时，他们的主张不是通过圣战恐怖行动把以色列人扔进海里，而是通过切实可行的外交手段建国。”因此，有人预言：“5年以后，如果伊拉克、阿富汗、也许还有取得了独立的巴勒斯坦和实现了民主的黎巴嫩成为拥有现代政治经济制度的繁荣兴旺的国家，美国就将得到荣誉和尊敬，有关发动反美恐怖活动的言论将大大减少。反之，如果这些国家依然混乱无序、战乱频仍——不像中欧而更像中亚——那里的人们就会怪罪于美国。”<sup>[12]</sup>

在全球化边缘苦苦挣扎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在遭遇了历史上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多次军事打击与经济制裁后，又遭到“9·11”来自美国等西方大国“反恐”为名的全面围剿与排挤，其现实处境极艰难。正如学者、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四世的堂兄希沙姆·本·阿卜杜拉·阿拉维所指出的，不论“9·11”事件的凶手是谁，都必须研究这一事件给包括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在内的全世界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这一恐怖袭击是卑鄙的，它倚仗的是阿拉伯—穆斯林世界中存在的愤怒情绪和受辱感（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人们觉得现行世界秩序使他们处于了次要地位和成了被抛弃者，因而感到受到了侮辱）。现在的这个恐怖组织竟有能力从事如此极端的暴力活动，打的竟是伊斯兰教的旗号，这就迫使我们这些穆斯林要站出来澄清我们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立场。西方固然应当承担它的责任，但我们也不应当推卸自己的责任。一种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带专制色彩的伊斯兰教势力在上升，这种势力组成了一些主张片面解释伊斯兰教教义的武装团伙。多数穆斯林都希望自己的宗教与其他的各种信仰和平相处，希望受益于现代世界提供的新机会。他们丝毫不想强迫一个国家的穆斯林公民和非穆斯林公民按一种单一的方式生活，更不想为宣传自己的宗教而向世界宣战。信仰

问题上的开放方式与极权方式之间的紧张形势并非仅仅与穆斯林有关。美国就有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派，这一派的言论与本·拉登的言论如出一辙。极端派犹太移民在宗教上要求建立大以色列，并且准备以这一名义把世界引向战争。在一个多技术、多文化和多信仰的世界上发展自己的全体穆斯林应当捍卫一种主张宽容的伊斯兰教。这就是说，我们应当同时捍卫社会公正、民主政治制度和尊重各国尊严与主权的国际关系。“9·11”事件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其肇事者是在向我们穆斯林提出挑战，我们应当接受这一挑战。但是，9月11日凶案却同任何具体的情况没有联系，它不是要纠正某个错误，而是一种战略行动。这种战略是基于一种宗教信仰，目的是要把整个穆斯林世界拖入反西方的全面战争。而美国最有效的战略是准确确定反击目标，有的放矢地进行反击。与此同时，美国人还应当克制如下欲望：向阿拉伯国家施加压力，要阿拉伯国家不公正地指责各个和平的伊斯兰派别。只有采取团结大家的办法，才可望孤立罪犯、阻止恐怖组织接纳新成员和防止出现穆斯林反抗局面。要实现这种战略，就必须彻底重申美国对待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政策。首先，美国必须要求以色列停止占领巴勒斯坦领土，承认巴勒斯坦人有权建立独立国家和有权以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所有穆斯林的圣城）为首都。美国重新审视自己的上述政策，才是赢得这场“新战争”必不可少的条件<sup>[13]</sup>。

但是，美国却将“反恐”战略不断扩大化，并对“大中东”进行民主改造，结果造成基地实力有上升趋势、伊斯兰激进组织“劫持民主”、巴勒斯坦与伊拉克变成了火药库、黎以战争大挫美以政治资本、伊朗和叙利亚成为美国实施中东战略的障碍等大大出乎美国预料的一系列“意外后果”，美国“反恐”战争的最大赢家是伊朗，其次是以色列，折本又败名的是美国，阿拉伯民族则是最大的受害者。甚至有学者认为，美国、以色列和伊朗控制着中东的政治命运：“耶路撒冷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德黑兰，而德黑兰的一举一动又会影响到巴格达。这是一种奇怪的局面。它反映出阿拉伯人在过去十年里遭受了极其严重的系统性的损伤。当前中东地区共有三大力量：以色列、伊朗和美国。而它们都不是阿拉伯国家。”“在巴格达的美国人、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和德黑兰的伊朗人掌握着阿拉伯世界的命运。在如今这样一种静态平衡下，这三个不同的统治者若想作出某个决定，他们的利害关系是彼此纠缠的。”<sup>[14]</sup>但是，黎以战争后，伊朗成为以色列和美国欲联合铲除的心头大患，为避免制裁与战争，内贾德政府全力争取外交斡旋能够化险为夷。面对美以联合攻势，伊朗核前景渺茫，其国家前途亦堪忧。

在历史的屈辱与现实的尴尬内外因素整合作用下，归返伊斯兰原初教义寻出路便成为伊斯兰复兴运动产生的重要驱动力，而来自不同国家的一些极端组织也在伊斯兰的旗帜下乘势将各自的目标合法化，并以极端、恐怖的方式加以释放，殃及无辜。“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政府不能不对这种潮流有所顾虑，它们不愿让它威胁到自己的继续存在。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对自己国内的极端伊斯兰

团体采取了严厉打击的措施,但并没有在意识形态上与它们彻底划开界线。这些被驱逐和被迫转入地下的极端伊斯兰分子转而组成一条新的战线,把目标对准美国和他的‘走狗’——阿拉伯国家的政府。”“华盛顿可以收买到一些国家政府的效忠:如每年向开罗提供 20亿美元的财政援助,向沙特和科威特提供军事保护,把巴基斯坦偿还债务的期限延长到 20年。但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与美国的这种联盟绝不会是全心全意、发自内心的。在阿拉伯世界,美国—以色列轴心仍然是一种敌人形象。”<sup>[15]</sup>沙特是美国的主要盟友,也是美国所需石油的头号供应商,但对美国的“大中东”战略采取了极有保留的态度,其他阿拉伯国家也表现出迟疑和犹豫,反映出这些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普遍存在的一种矛盾心理:“要对付难以根绝的恐怖主义——在每次实施报复行动后又滋生出新的力量,唯一方法仍然是老一套的达成公正全面的和平。目前没有达成和平的希望,也无需敦促美国加快和平进程的步伐。美国无心倾听阿拉伯人的意见,哪怕他们是美国的盟友。他们必须保卫自己,即便在派遣警察搜捕他们所知道的一切极端分子和那些鼓吹讨伐美国的人时,他们也无法抑制这种感觉。”<sup>[16]</sup>这些亲美的阿拉伯政府领导人的矛盾心理是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群体文化心理死结的表现之一,伊斯兰极端组织成员外现为一种刻骨的仇视与极端的宣泄,大多数民众则表现为一种无奈的怀旧与假想:“如果伊拉克政府可以确保稳定,严厉打击破坏输油管道的活动,通过重新出口石油的方式重建伊拉克经济并避免其国内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派系斗争的话,那么伊拉克还有可能再次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阿拉伯大国。”“如果埃及能够推进其正在进行的雄心勃勃的经济自由化改革,如果穆巴拉克总统能够克服他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恐惧心理而在政治上放宽统治的话,那么这个阿拉伯世界的传统领袖也有可能重新扮演它昔日的角色。”“如果沙特阿拉伯人能够在这场打击本国激进分子的国内安全战役中获胜,并控制住越发难以驾驭的什叶派少数民族的话,那么他们可能会恢复其滚滚而来的石油财富本应赋予他们的影响力。”“他们担心自己既要去继承已经归于失败的阿拉伯文明,又被宣判成为自家故事中的配角而非主角,还命中注定任凭别人去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sup>[14]</sup>他们甚至怀念强人统治的中东,但现在没有哪个阿拉伯国家可以像萨达特或纳赛尔执政时期的埃及那样对该地区的事务说一不二了。

像西方国家的公众一样,一些穆斯林国家的居民也开始对伊斯兰激进势力感到担忧,这是美国的一个研究中心进行大范围民意调查得出的结论。2005年春天对 17个国家的 1. 万人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在穆斯林国家,激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产生的根源是不同的。贫困、失业和教育的缺乏都是穆斯林经常提到的问题,但像约旦和黎巴嫩这样一些国家也提到美国在中东的政策也是产生伊斯兰激进势力的原因”<sup>[17]</sup>。由历史和现实结成的心理死结的核心问题仍是美国的中东政策,正是由于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主义实行的双重标准政策,当地的仇美情绪越积越厚,甚至成为美国人眼

里的一种仇恨思想。叙利亚移民部长布赛纳·沙班曾有精辟的案例分析:赖斯曾对驻阿富汗美军说,“不同于以往的大中东将是稳定而民主的,有朝一日,孩子们不必再担心那种曾促使那些人在(2001年)9月11日驾驶飞机撞向那些大楼的仇恨思想。”——“赖斯认为,我们这一地区存在‘仇恨思想’,居住着‘那些人’,那些恐怖分子。”“这一荒唐的推断体现了美国整个‘反恐战争’所依据的谬论。这场战争严重破坏了美国在全世界的声誉,由此产生的灾难性政策将在未来数十年中损害美国与阿拉伯世界关系。”——“赖斯言论中的另一个危险的观点是,‘9·11’袭击事件是美国在中东奉行错误政策的正当理由。这是荒谬的。美国人到了现在应该明白——但是我认为他们还不明白——‘9·11’事件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巨大影响不亚于它对美国人民的影响。”“美国人恐怕不了解中东真实的现状。很明显,从你们的‘嵌入式报道’中看不到这些。现状是,巴勒斯坦各派组织遭到肢解,黎巴嫩抵抗力量被解除武装,叙利亚政府被妖魔化。而与此同时,以色列违反要求其撤军的所有联合国决议,继续占领自 1967年以来一直占据着的阿拉伯领土。以色列极端分子正在抢占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聚居区。正在建设中的隔离墙将使数万名巴勒斯坦人与他们的家园分离。”“赖斯必须明白,一个民族是不会屈服于不义之举的。中东人民在历史上一一直在与侵略和占领作斗争,他们将斗争,直到实现自由、正义和尊严。”“我敢肯定,赖斯认识到她从以色列研究机构——在这些机构看来,中东除了可供榨取的资源以及手无寸铁、面对占领和压迫无能为力的人民以外一无所有——得到的报告和阿拉伯人民有着创造文明和为了和平而改变信仰的悠久历史这一事实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sup>[18]</sup>德国学者也提醒说,“美国和与其结交的盟友应当考虑,如何使近东和中东的伊斯兰国家更有力地参与到国际社会中重要机构的决策中来。要求这些伊斯兰国家实现严格的民主化只是其一,仅靠这种方法大概不会对提高这些国家和人民的自我价值感有多少帮助。如果伊斯兰恐怖的起因扎根于受侮辱和受伤害的情绪,这种情绪又在不少人身上转变为仇恨,那么西方国家必须通过使伊斯兰国家和人民更有力地参与决策,从根本上消除它们的自卑感。国际社会的多边机构为此提供了适当的框架”<sup>[19]</sup>。

要想早日解开这一集体心理死结,除继续抵制美国不公正的中东政策外,更要加快阿拉伯—伊斯兰国家自身的社会改革,这才是解除现实困境的根本所在。

伊斯兰教历来就有教法创制的自我更新机制,而“旨在使伊斯兰保持纯正并成功应对各种挑战、适应不同时代和各种环境而进行的一切思想活动,都是创制,其根本宗旨是正确理解伊斯兰的核心精神,弘扬和发展伊斯兰文化,使之与时俱进,历久弥新。”<sup>[20]</sup>“创制之门已经打开”成为当前阿拉伯思想界的一种共识,阿拉伯知识精英们认为,“我们处在十字路口,我们面前,一条是僵死之路,记满了坐失良机的英雄的名字;另一条是时代落伍者之路,他们对发生的事件总感到突兀;第三条路是做好准备、迈向未来者的道路。”而“通

向未来之路——这是别无替代的必然选择”<sup>[21](P73)</sup>。但是,阿拉伯—伊斯兰国家要想改变现状确属不易,尤其应注意,政治上,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实变革的关系、各国利益与阿拉伯—伊斯兰地区利益的关系;经济上,兼顾世界能源市场与本国经济多元发展的关系;文化上,加大对外宣传的力度,向世界传达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真相。其中,安全、能源与民主是较棘手的现实问题,应妥善处理好在领土被占、圣地蒙羞、尊严遭辱等特定境遇中正当自卫与恐怖袭击之间的关系,在能源既是美阿合作的基础,又是两者关系紧张的根源的前提下,应竭力寻求在国际能源市场与美欧霸权利益之间的生存空间。当然,要想彻底改变被西方传媒所臆造的“好战而恐怖的伊斯兰”形象,就必须以开放、宽容的心态与异质文明进行对话和交流,还伊斯兰文化的和平本质。正如科威特国家安全顾问谢赫·萨巴赫·哈利德·哈马德·萨巴赫所指出的:“实现宽容和社会安定的关键举措将包括通过培

训清真寺中诵经的神职人员以遏制引起憎恨情绪的讲话,禁止慈善团体捐助恐怖组织和‘神话民主活动,包括让妇女更广泛地参与’政治和经济生活。”且称此为伊斯兰教的“中间路线”<sup>[22]</sup>。

质言之,曾经的辉煌与当下的衰败、曾经的核心与目前的边缘化所造成的失落感,三大圣地、《古兰经》与先知穆罕默德的相继蒙羞和遭辱所造成的受辱感,历史的创伤记忆与现实的生存困窘共同积淀成了一种顽强的集体潜意识,形成阿拉伯—伊斯兰民众仇恨与暴力交织的心理死结,外现为以暴易暴、铤而走险及不断丧失文化认同。因此,整个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应对“已陷入的屈辱处境时”,“是该变愤怒为力量,变忧伤为工作,把责备、谴责转变为负责任的行动和缜密的计划了”<sup>[21](P45)</sup>。否则,将面临更为严重的民族和地区的倒退,危及世界和平与稳定。

#### 参考文献:

- [1] Patrick J. Buchanan. The Death of the West How Dying Populations and Immigrant Invasions Imperil Our Country and Civilization, Thomas Dunne Books, 2002, p. 118
- [2] 奥古斯托·洛佩斯·克拉罗斯,达尼埃尔·普莱特卡. 中东不改革就有爆发革命的危险 [N]. 国际先驱论坛报, 2003-11-06
- [3] Anthony H. Cordean. Ten Reasons for Refuging US and Saudi Relation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anuary 30, 2004, <http://www.csis.org/burke/saud21/index.htm>.
- [4] Martin Sieff. Sand in Our Eyes U. S. - Saudi Relations After Iraq. The National Interest/Summer, 2004
- [5] 高祖贵. 美国与伊斯兰世界 [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5
- [6] 左文华, 肖宪. 当代中东国际关系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 291-292
- [7] 中东地区安全新概念 [N]. 生活报(沙特), 2004-12-31
- [8] 维克多·戴维斯·汉森. 伊拉克问题削弱了我们吗? [J]. 评论(美国网络杂志), 2005, (2).
- [9] 赖纳·赫尔曼. 建设性的外交政策——阿拉伯世界需要埃及外交 [N]. 法兰克福汇报, 2005-03-08
- [10] 娜蔓·艾尔阿里. 伊斯兰恐惧症: 误解的威胁 [N]. Portsmouth Herald(日报), 2005-10-08
- [11] Graham E. Fuller. The Future of Political Islam,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36
- [12] 法里德·扎卡利亚. 布什对哪些问题的理解是正确的 [N]. 新闻周刊(美国), 2005-03-14
- [13] 希沙姆·本·阿卜杜拉·阿拉维. 穆斯林与世界公民 [J]. 外交世界(法国), 2001, (10).
- [14] 马丁·沃克. 华盛顿—耶路撒冷—德黑兰三角 [N]. 全球主义者, 2005-02-10
- [15] 迪特里希·亚历山大. 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处境尴尬进退两难 [N]. 世界报(德国), 2001-09-25
- [16] 迈克尔·比尼恩. 阿拉伯领导人可能成为恐怖主义袭击的最终受害者 [N]. 泰晤士报, 2001-09-12
- [17] 让·皮埃尔·图戈瓦. 全球穆斯林也对伊斯兰激进势力感到担忧 [N]. 世界报(法国), 2005-07-17
- [18] 布赛纳·沙班. 美国在中东问题上的危险设想: 来自大马士革的观点 [N]. 洛杉矶时报(网络版), 2005-03-25
- [19] 弗里德里希·L·泽尔. 威慑失灵——对付暴徒的传统方法不再适用于抗击现代的恐怖主义 [N]. 商报(德国), 2005-11-29
- [20] 丁俊. 论教法创制与文化创新 [J].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06(5).
- [21] [埃及]侯赛因·卡米勒·巴哈丁. 十字路口 [M]. 朱威烈, 丁俊译.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 [22] 吉姆·霍格兰·海湾的狼——阿拉伯国家的两大忧虑: 美国和激进的伊斯兰组织 [N]. 华盛顿邮报, 2005-12-08

责任编辑: 李有智